

学习

活页文选

XUEXI HUOYE WENXUAN

-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 ⑦ 韩长赋 从江村看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振兴
- ②② 张志明 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
- ③⑩ 马识途 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国特色
 ——一位百岁作家的心声
- ③⑧ 赵树丛 论儒家思想中的传统生态意识

中央宣传部主管
《党建》杂志社主办

2018年6月9日出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会议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形成了今后5年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框架。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

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抓紧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做到乡村振兴事事有规可循、层层有人负责。要针对不同类型地区采取不同办法,做到顺应村情民意,既要政府、社会、市场协同发力,又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目标任务要符合实际,保障措施要可行有力。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稳步推进,一事情接着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一系列重大部

署,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的举措,构筑了全党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全面部署。未来3年,还有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再接再厉、精准施策,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场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大扶贫工作格局,坚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确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

会议强调,要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条件,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特殊困难,着力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政策倾斜力度。要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帮扶举措,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全力推进就业扶贫,深入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加强生态扶贫,着力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强化综合保障性扶贫,开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开展扶贫扶志行动,树立脱贫光荣导向,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要完善脱贫攻坚考核监督评估机制,提高考核评估质量和水平,切实解决基层疲于迎评迎检问题。要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加强对脱贫一线干部的关爱激励。要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集中力量解决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坚决依纪依法惩治贪污挪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强占掠夺等行为。要深入宣传脱贫攻坚典型经验,宣传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北京2018年5月31日电)

从江村看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振兴

韩长赋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需要深入调研、统筹谋划。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百乡万户调查活动,组织干部开展驻村调研,全面摸清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近期,我到费孝通先生80年前调查过并写出《江村经济》一书的村——江村(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开展调研,对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些思考。

一、中国乡村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前,中国之乡村,从内地到沿海,从城郊到农区,从山区到平原,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每年有超过1000万农村居民市民化、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农村即将消除贫困、全面小

康。可以说,中国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江村也在微观层面,演绎着这个时代变局。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国际化,让农业从计划封闭变成了自由开放。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时间和劳动的自由支配权,想种啥就种啥、想吃啥就吃啥,这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大集体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流通范围大大拓宽。江村的太湖螃蟹、太湖三白销往全国各地,浙江白茶、山东苹果、赣南脐橙等则摆上了江村百姓的餐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更是与全球农业融为一体。2017年农产品进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国际化,既给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第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民从土里刨食、温饱不足变成了进城务工、走向小康。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洗脚上田、进城务工。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2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2.35%,2.8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

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割麦插秧累断腰”已成为历史，种田比以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时。江村的村民跟我说，现在腰包更鼓了，日子更好了，笑容更多了，寿命更长了。近年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不少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当农民、搞农业，这表明农业农村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打开了农民放眼世界的通道，这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革命性的。过去通讯不发达，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收音机、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新世纪以来，手机、电脑、网络向农村覆盖。据统计，我国农村网民已超过2亿。现在，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随时随地微信交流、视频对话。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把握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引导加快变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光荣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时刻关注这个变局、全面把握这个变局,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方向。

二、江村变迁是我国乡村发展的缩影

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江村本名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1936年,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记录下了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涉及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方方面面,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

村落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全貌。调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分析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契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费老那时仅是一个27岁的青年,就脚踏实地地开展实证调查,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江村,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召开了座谈会,走街串巷访谈农户。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小康,家家住上楼房、通上自来水、装上抽水马桶、使上热水器、用上液化气,宽带、数字电视全覆盖,村道全部水泥硬化,90%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村里充满生机活力,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村民形象。可以说,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保留着一些传统,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第一,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80年前,江村80%农户养蚕,主要是男耕女织,男的种植稻桑,女的养蚕缫丝。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村里成立生丝合作社,办起了生丝厂。新中国成立后,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成为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丝织厂等村办企业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进入新世纪,村里个体、私营工商业蓬

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丝织、针织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全村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32432元,村集体收入265万元。江村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从过去的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产业优化升级,链条纵向延伸,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村民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蒋伟芳现在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生产厂长,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夫妻店”,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目前,村里有近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有的代工,有的自产自销。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去年10月到现在就卖了20万件。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

第二,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田面两层,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90%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佃户。1951年,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时

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革开放后,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30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从私有私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无论是费老描述的“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还是现在村民认为的“家里可以没门,手里不能没田”,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也正因此,80年来,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面积精确到分厘。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积精确到厘毫。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所有权)、田面(经营权)两权分离相比,现在的“三权”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更防止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公平。村民陈月生说,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家里5亩承包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座谈会上,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30年延包政策,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

第三,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较大调整,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1935年,江村有359户1458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起伏,村内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目前,江村有420户1680人(不包括后来合并的村),较80年前分别增长了17%和15.2%;60岁以上人口占比32.4%,增长了近26个百分点。80年前,村里只有10家外来户,主要从事理发、银匠等特殊职业;现在,来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业,最高曾达1000多人。尽管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老所描述的那样,维持着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每一户都可通过亲属、血缘关系的扩展,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我在村民周小芳家看到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她的外婆、母亲、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这种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脉络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在江村很普遍。江村至今仍保留着妇女开茶会的习俗,关系较好的邻里之间轮流举办茶会,吃茶话事、交流见闻,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外来人则始终游离于外,现在的打工者与当年的手艺人一样,仍不能落户江村,与本地人的关系仍然泾渭分明。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户不能获得耕地和宅基地。

第四,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传统家庭观念仍

然根深蒂固。80年前,费老描述下的江村,人畜混住,人们每天为温饱奔波操劳,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有溺女婴或流产来控制人口的传统。今天的江村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镇小社区,村民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里人没有多大不同,但婚姻、财产等家庭观念与传统仍没有断代。两头挂花幡、招女婿等传统婚姻习俗延续至今。由于现在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类婚姻模式越来越普遍。全村现有139个家庭采取两头挂花幡的婚姻模式,招女婿190人。我走访的两户人家都是独女户,结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双方家里都有住房,来回走动。在家庭财产处置方面,家长仍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只有结婚后与父母分家,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样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村民姚玉坤给女儿女婿按月发工资,儿子因未婚而没有核算工资。也正因此,江村的家庭结构大体保持稳定,1935年江村户均4人,2016年户均3.98人,都是小规模家庭。

第五,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础。早在1929年,江村实行地方自治,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担任村长。1935年,江村实行乡镇保甲长纵横连保连坐。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保甲制,建立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由生产大队改为

行政村,实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80年来,江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和调整,但自治和德治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8岁的周梅生讲,邻里有矛盾纠纷,解放前靠宗族势力,现在是找村委会,只有大的经济民事纠纷,才走司法渠道。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涉及承包地调整、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很少有纠纷和矛盾。江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有资望的群体,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等各类议事监督机构,广泛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村民周新根曾任生产队会计和乡镇企业领导,在村里很有威信,退休后被村民选为小组长。在江村,尊老爱幼、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传统礼治、德治秩序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为健全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全面看待农村,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规律

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

江村虽只是一个微观主体,但其80年的变迁基本反映了乡土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江村可以看到,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很多传统仍然保持着

稳定和延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平稳与跃升共进的状态。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

一要坚持循序渐进,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走在江村的里弄小巷,随处可见外观现代、装修精致的别墅楼房,一些传统砖木结构平房点缀其间,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他们住惯了老房子,不愿意搬到新房。传统与现代、变化与不变,共同阐释着江村80年来的变迁。这种变与不变的选择,已经渗透到江村的方方面面,最为典型的是村民对土地承包问题的处理。江村的土地以组为单位发包,二轮承包以来,应对农民市民化的新情况,各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可谓一组一策。有的“生不增、死不减”,一直没有调整土地;有的每5年调整一次,动账不动地;还有的每年调整一次。从江村的土地、人口、婚姻、家庭等制度看,即便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与外界联系紧密的这样一个村落,村庄的发展变化也是渐进的、自然的,而不是断代的、割裂的。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既要着眼长远目标、不违背发展方向,又要立足当前实际、不违背发展规律。要克服求大求快、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处理好快与慢、量与质、点与面的关系,既把握方向,又把握节奏,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系统性风险,打牢乡

村发展的根基。

二要坚持城乡融合,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江村,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水电路气房讯网等基础设施齐全,将近一半的自然村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道集中到处理池,实现了无害化处理。生活理念也日益跟城镇接轨,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看电影、跳广场舞、打篮球、上网等成为村民的时尚。走在村里,城市文明对江村的影响和冲击无处不在。与此同时,新建起来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里的历史档案、文化习俗,这是江村的“根”,维系着世代传承的脉络。村民姚富坤多次接待费老访问江村,现在是村里费孝通纪念馆的顾问,他热心于向外界介绍江村的传统民俗和乡土文化,被人们称为“农民教授”。在江村可以感受到,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各有千秋,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时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产品是乡村所追崇的,而乡村宁静的自然环境、独有的生活习俗、丰厚的历史传承也是城里人所向往的。因此,才有农村人进城、城里人下乡的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开始加快,城乡关系正在重塑,城市与乡村的鸿沟逐步打通。推进乡村振兴,要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拓展,也要尊重乡村文化、传承农耕文明,通过以城带乡、功能互补、有机衔接,实现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融合互联、协同发展,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共存共

荣、互促互进。

三要坚持尊重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江村座谈时，大家纷纷表示，村庄环境改善了，居住条件变好了，看病养老有保障了，挣钱渠道更多了，幸福指数更高了。78岁的姚大官家里四世同堂，每个月自己有几百元补贴，看病能报销一半，他感慨日子越过越好。谈到乡村振兴时，大家劲头十足，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村民周小芳多次接待过费老，准备借助费老的名人效应办民宿。养殖大户倪林坤经营着140多亩蟹塘，想联合村里的养殖大户成立合作社，共同闯市场。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凡是农民称道的、满意的、喜欢的，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凡是农民急需的、期盼的、憧憬的，我们就要努力去解决。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乡村是农民的家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不能代替农民、替农民决策，更不能排斥农民。

四要坚持统筹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从1936年费老初访到现在，江村的农房经历了平房、楼房、别墅等五代变迁。第一代房子保持了近40年，当时是因为贫穷；改革开放到现在的40年，房子却换了四代。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规划，造成了巨大浪费。农房建设无序，没有统一规划设

计和标准,以至于拆了建、建了拆,这是我调研时基层干部和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市里的同志讲,目前农房建设没有法律规范、没有部门管理、没有总体规划、没有房型设计、没有建设标准、没有质量验收,这是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记得我2000年去波兰考察,波兰是土地私有制,当地农民建房,可以自己决定内部结构、装修等,但建在哪儿、面积、外观等受到政府严格的规划管制。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一定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想好了再干,防止折腾、防止浪费、防止走弯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必成美画。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个性和特点,要充分尊重乡村的自然机理和历史文脉,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发展元素结合起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而不是缩小版城市,让山水林田路村成为乡愁永远的记忆。

五要坚持人才首要,确保乡村发展后继有人。江村巨变的根本,是有一批文化素质高、市场意识强、能吃苦敢拼搏的人才。村民周玉官上世纪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回乡创办了江村第一个个体工商企业,曾得到费老的鼓励和指导,带动了一批江村人下海创业。这次到江村,我还惊喜地发现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影。“70后”沈斌先后在镇农办、烂烂村工作过,去年来到江村任村支书,他一心想着推动江村大发展。“80后”周春燕大学毕业后回村担任妇女主任,每天活跃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为村民搞

好服务。“90后”姚凌超大学毕业后回村开网店,将村里生产的针织衫销往全国各地,成为新生代偶像。由于生活条件好、发展机会多,江村年轻人外流的不多。这些年轻人正在为这个传统村庄注入新的活力。这表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要始终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既搭好大舞台留住人才,又种好梧桐树引进人才,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目前,农村还有2亿多劳动力,要加大培训力度,充分挖掘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经理人等农村能人,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今天的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吸引农民工、大学生、科技人员及乡村走出去的工商业主、退休人员等回流,鼓励引导各类人才投身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

(选自2018年6月5日《经济日报》 作者系农业农村部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

张志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灵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灵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重要价值取向

和重要建设目标。

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仅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面领导,而且也包括对党的自身建设的领导,特别是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各级党的组织对管党治党的责任,强调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第一政绩是党的建设,第一责任也是党的建设。

重申并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全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是强调坚持和保证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

和定力,确保党始终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再次是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需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强调提升政治能力的保证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是相相应的。政治是科学,政治这门科学最大的规律是人心向背,即“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因此,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能够为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提供强大动力和道义支持。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最新成果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包含了五个方面重要内容。

第一,回答解决了一个重大课题,即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好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及如何长期管好治好这样一个党。这是在我们党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后,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首先需要廓清的重大时代课题。

第二,强调了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即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第三,明确了一个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目标,即新时代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四,确立了一条党的建设的主线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即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第五,作出八个方面战略部署。一是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二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三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中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五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六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七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八是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地生根,变成全党可以贯彻执行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鲜明主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因此，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党的事情要办好。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一是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首先从讲政治说起。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二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建设为讲政治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基础，首要任务是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三是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第一，抓思想从严，补足精神之“钙”。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第二，抓纪律从严，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

策。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四个服从”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第三,抓治吏从严,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以“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破解“四唯”难题。坚持严管与爱护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第四,抓作风从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生死存亡。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着力从思想上正本清源。特别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率先垂范、以上率下、身体力行,形成“头雁效应”。强调必须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长效机制,以好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第五,抓反腐从严,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有腐必反、除恶务尽,坚持惩治这一手不放松。坚持零容忍态度不变、猛药去疴决心不减、刮骨疗毒勇气不泄、严厉惩治尺度不松。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依规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重大创新

制度治党的意义在于以制度化、程序化、具体化方式治理党内政治生活,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这条制度治党新路的核心是坚定不移推进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治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重大创新。强调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力争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强调抓好党内法规制度的落实。发挥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加强监督检查和追责问责,注重以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提升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影响力。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按照“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原则,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力推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取得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

(选自2018年5月30日《学习时报》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教授)

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国特色

——一位百岁作家的心声

马识途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需要对文化市场的资本运行有效监督,需要雅文学和俗文学更加互信互助,需要更加注重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说到底,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供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

我今年已进入一百零四岁了,年老体衰,已无力在文学创作上再作贡献,但我和一些“心存魏阙常思国,身老江湖永矢志”的老作家一样,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创作思想的走向,寄予深切的关注。

目前,我正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深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工作准绳的重要性。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第十次文代会和第九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都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中国文艺要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屹立于世,并且语重心长地指出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讲话让我深受

启发,我曾反复思考,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中国特色呢?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理论精髓和深刻内涵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彰显它呢?

在细读和研究后,我试图用几句话来加以概括: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中国精神,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有中国新风格和新气派的生动的中国话语,讲好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并艺术性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于中国人民。

我以为中国的作家都应该在自己的创作中彰显这样的中国特色,而要彰显这样的中国特色,就需要识知和协调以下三个关系:文学与资本的关系,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的关系。

自尊自励 增益世道

没有资本的投入,文艺活动无法持续进行,这一点不言而喻。过去是由国家按计划提供创作资金,所以文艺创作多注重社会效益,很少考虑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容许资本进入文化市场,几十年来已取得辉煌成就,人所共见。

而资本有自我增殖的本能,关键就看投资者意图和资本运用的优劣。由于投资动机不一、目的不同、运行办法各异,产生了优劣不同的效益。在文化市场中,有的投

投资者是为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不计回报,追求社会效益,这种优良品质受到国家和人民的赞许;也有一些投资者依法依规投资文化市场,以优良产品获得合法利润,这样的投资者占大多数,为社会所认同;唯有另一类投资者,为数不多,为害却烈,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恶性发展。这是一群运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食利者,他们窜入文化市场,搜寻和瞄准最能获得暴利的文化投资项目。当发现一些低俗恶俗的节目容易受到青少年和追求娱乐至上的人喜欢,因而可以获得丰厚利润时,便挟雄厚资本,凭借最易传播的网络平台,收罗少数醉心名利、实是写手的所谓作家,穷思极想,写出低俗作品,交由唯利是图之徒加以制作,投入文化市场,牟取暴利。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创作出自己的作品的同时,也就制造出自己的读者。他们千方百计地培养、制造牟利需要的“粉丝”,竭力侵占文学的阅读领地和文化市场。随着利润的诱惑不断膨胀,他们日益突破文化管理的藩篱,推出“三俗”产品,甚至喊出要“爱得死去活来,打得昏天黑地,笑得气闭肠断”的所谓“枕头、拳头、噱头”的“三头”作品,污染市场,毒害观众。

当然,这只是一时出现的不良文化现象,已引起文化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治理,大有改观。相信文化市场的食利之徒只是极少数,“三俗”作品的写手应自尊自励,成为真正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家。

雅俗共美 文学大兴

中国当代文坛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就是所谓雅文学和俗文学。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似乎各有特色，在两股平行的轨道上行进，遥相对望，很少交流。直到作为通俗文学当代继承者的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声势煊赫，投资纷纭，挤占了雅文学的阅读园地，直到有些雅文学作家喊出文学“边缘化”了、“式微”了，才引起广泛注意，这两种文学才相互注视和关切，相向而行，开始互助互学的交流。近几年来，成效显著。

自新文化运动起，西学东渐，白话文学发展出雅文学，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主流，涌现无数新文学作家和广泛的创作活动，出版大量文学作品，其中不少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现在的文学出版物数量的确是不少，甚至听说有一年出版了四千部长篇小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曾有四千位作家争相去爬文学金字塔的高峰。一年四千部长篇小说，恐怕不少是粗制滥造，只能落入化为纸浆的命运，而那么多作家想登上塔尖，其中大半也只能半途而废，甚至会掉下来，这是多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从诞生高峰的目标来看，我们现有高原的高度还不能说很高，我们的作家应该、事实上也正在不断为建设更

高水平的高原、促成高峰的出现而努力。当然,要出现更高的高峰,恐怕更是不容易的事,珠穆朗玛峰到底只有一座。所谓“李杜出而唐诗亡”,后来还有“唐诗衰而宋词兴”的说法,这些都说明,要想出现更高峰,必须是有前所未见的智慧和胆识,能创造出前所未见的文学环境和文学作品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前程远大,任重道远。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小说,其实是我国有长远历史、深厚影响的通俗小说的现代继承和发展。我国通俗小说发端于唐宋如《红拂传》之类的传奇,兴盛于明清勾栏瓦舍的“说话”,而以《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拔其尖。不过据查,其实在宋朝苏轼时已见市井有“说三国”的流行。降至于清末民初以后,通俗小说寄生于时新报纸副刊,以长篇小说连载为主要形式。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派、社会小说派,各有千秋,出现了张恨水、金庸这样的拔尖作家,成为今日部分网络小说的精神宗师。在继承中国通俗小说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侦探、悬疑等类型化通俗小说,就形成今天各派网络小说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当然,有些低俗以至“三俗”作品也混迹其中。

对于网络文学,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要善于引导,也要宽容一点》,我始终以为雅文学和网络文学是中国当代两支文学大军,应当相伴相容,互助互学,取长补短,提高

水平。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两支大军日益靠近,最后达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非古非洋、亦中亦洋的新文学。这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幻想,但是我仍然想仿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话,说出我的希望:“美雅之美,美俗之美,雅俗共美,文学大兴。”

品格为上 娱乐有度

一切艺术作品都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但近年来也有人提出艺术作品有思想性、艺术性、认知性、教育性、娱乐性的所谓“五性”,我不以为然,却难以分析,直到读到仲呈祥同志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判明。他提出要区分文艺理论上两组不同的概念,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产生于作品创作过程中,而认知性、教育性和娱乐性以及我们经常说的观赏性则产生于作品问世以后。一个在当时,一个在事后。思想性和艺术性属于创作美学的范畴,认知性、教育性、娱乐性以及观赏性等都属于接受美学的范畴,是不可以混同的。

我很赞同这种说法。一件艺术作品投入文化市场后所产生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虽然都属于接受美学范畴,但是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市场里过分强调娱乐性,以至于弱化美学观赏性的现象。娱乐性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应该有个度。过度强调娱乐性就有可能让食利之徒为了获取扩大化了的利润,而乘机大量生产和制作“三

俗”作品。这些作品与我们提倡的主流价值观相左,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带来不小的危害。

我们的消费者进入文化市场消费,有接受倾向的差异。有些消费者倾向于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欣赏,希望真正在精神上有所收获。也有的消费者单纯是为了消遣娱乐,在工作学习之余,愉悦精神,放松身心,这也无可厚非。但还有一些消费者,在娱乐至上思潮影响下,更倾向于感官刺激,肉欲享受,这正是食利者投资所迎合的。他们提供的低俗作品,破坏良好的美学观赏环境,助长文化市场的秩序混乱,使寻求美学观赏的人们避而远之。可以说,这是文化市场过度强调娱乐性,忽视社会效益而只求经济效益的必然结果。这样的现象,是我们的文化政策所不容许的。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者重要组成部分的作家艺术家,对维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努力为这个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

我对上述三个关系所作的诠释,无非是希望:第一,对文化市场的资本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坚决抵制食利之徒制造出的不良文艺作品;第二,雅文学和网络文学更加互信互助,提高艺术水平,追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好作品,共同创造文明的文化环境;第三,不要过分强调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应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说到底,就是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的文

化市场提供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

(选自2018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论儒家思想中的传统生态意识

赵树丛

儒家思想长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的底色,直到现在仍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可以称之为儒家传统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历经千年,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儒家传统生态意识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阐发,对于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有重要意义。

儒家认为,人类社会天然地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大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的一切原料无不来自于自然界,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从这种认识出发,儒家有认识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适度利用自然,植树惠民、克己节制,生态教化、以人为本,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等生态意识。

“认识自然、敬畏自然”意识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儒家生态意识首先是建立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周易·序卦传》）“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许慎《说文解字》）“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传上》）儒家认为阴阳相生，五行相克，人源于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很难产生征服自然的雄心。这种认识会产生敬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段话揭示了孔子对大自然规律的敬畏。敬畏自然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前提和基本规则。孟子提出天道是人道的终极来源和根本依据的思想。《礼记·礼器》中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李白的“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也表达了对大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敬畏思想。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都依赖于对自然的认识，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也需要对自然的正确认识。儒家对自然的认识是有科学成分的，它能让人们产生敬畏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意识。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自然辩证法》）这就是一

种敬畏自然的意识。

“保护自然、适度利用”意识

生态文明,说到底,是人对自身行为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体系。《论语》中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人们也钓鱼打猎,但是孔子不用渔网捕鱼,也不射归巢的、歇宿的鸟,因为它们可能正在养育幼鸟。孟子更明确指出:“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麝不卵,以成鸟兽之长。”(《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则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鸛鼈、鱼鳖、鰍鱓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洿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古时以索取自然为基本生存手段,但儒家生态意识中有许多保护自然的戒律。这种保护自然的观念对中华文明绵延传承功不可没。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中,虽然也曾向自然过度索取,但因为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对自然的保护和适度利用意识始终占统治地位。“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认为,破坏生态破坏自然,乱砍滥伐滥捕滥猎,也是一种不孝。孔子的学生高柴提出了“启蛰不

杀,方长不折”,曾参提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的说法。这些思想一直是古代中国民众和社会的主导思想,在大量的帝王诏书、村规民约、族戒家训中都有体现。直到今天,破坏环境、滥伐森林、污染空气水土仍然是民众最深恶痛绝的行为。习总书记指出:“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这与儒家传统生态意识是一致的。

“植树惠民、克己节制”意识

曲阜孔庙现存有“先师手植桧”,相传是孔子亲手所植。后人都以此把孔子推崇为植树造林的先贤。《西行漫记》中就记载了毛主席1920年春途径曲阜时参观“先师手植桧”的感慨:“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曲阜孔林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的家族墓地园林,现有名贵树木10万余棵,草本植物342种,是一个古树奇木的资源库。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孔子死后,弟子们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鲁人世代代无能名者。”特别突出的就是“子贡手植楷”,虽然现在仅存枯楷树桩,但人

们都以此为实践保护自然、敬师添绿的楷模。当代中国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有植树惠民意识。习总书记指出:“植树造林是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径,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相比,生态欠债依然很大,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缺林少绿依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造林绿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的老部长梁希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森林发展事业,他梦想有一天中国大地“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以造林为头等大事,目前是世界人工林种植量和保存量最多的国家,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植树惠民基因的传承。

克己节制,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孔子对人类保护自然的要求和准则。当前我们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资源约束不断趋紧,更应该注意克己节制,节约资源。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要求人要有节制自己的能力。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也是一种克己节制。习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

不够中国人消耗。”

“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大部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是来自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型使用。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什么鱼也没有了。”这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生态教化,以人为本”意识

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目标,又是过程,特别是人们接受生态教育和人文教化的过程。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据说孔子很喜欢在银杏树下阅读和教授弟子,后人将他教诲弟子的地方称为“杏坛”,至今在山东曲阜孔庙诗礼堂前还生长着宋代所植雌雄银杏树各一株以示纪念。连在衢州的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也植有两排高大古老的银杏树。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在山东安丘的读书处,至今仍生长着一雄一雌两株参天银杏,传为孔子看望女婿时带去树苗,公冶长亲手所植。孔子在讲人的教育与环境关系时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王肃《孔子家语·六本》)他还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用松柏比喻人的情操坚守。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常设在风光旖旎的山林之中,也是意识到优美的生态环境本身对人就是一种良好的教育。

《论语》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儒家传统生态意识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人，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孔子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生身父母、衣食父母，保护自然，不竭泽而渔，让自然更好地休养生息，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发展。《吕氏春秋》言：“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保护自然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这本质上是以人为本。

“天人相类、天人合一”意识

《大戴礼记》记载孔子说：“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这种对待树木的惜生观念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紧密联系，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

在儒家看来，人和自然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共通的。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

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大学问》）所谓大人，就是君子，就是得仁的人，仁者必有天人合一的意识。“仁”在《论语》中出现的了100多次，也是孔子生态思想的终极归宿。一方面他用对自然的态度辨别人的品性德行，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另一方面他把自然保护的业绩作为“仁政”的标志。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在卫国蒲地当官3年了，孔子前去察其政绩。孔子一路细看，情不自禁地3次脱口赞叹：“善哉由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孔子还赞扬森林树木自然的“仁”性：“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朱熹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以得之以为心者也。”（《仁说》）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最大的“仁政”“仁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

建设生态文明,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伟大目标一定能实现。

(选自2018年5月21日《中国绿色时报》)